

## 重返古典与流动性身份：郁达夫在南洋的跨国界转向

### Return to Classicism and Fluidity of Identity: Yu Dafu's Transboundary Turn in Nanyang

钱杉杉\*

(QIAN Shan Shan)

何启才\*\*

(HO Kee Chye)

#### 摘要

人与地域相连接，郁达夫自中国来到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成为南来文人的代表，促进马华文学的发展。在南洋，与其他文人跨文化转向的表征不同，郁达夫的文学创作具有重返古典的姿态，即白话文小说创作减少，以旧体诗词与报章评论的创作为主，亦体现其流动性身份的特征。在古典主义训练、文学的工具性作用、现实政治考量等客观因素以外，迥然相异的原乡与在地的周遭事物转变与亲友经历影响，投射于郁达夫自身，其情感上的遗民状态与重返古典的姿态相一致，亦是这一特殊跨文化转向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郁达夫、重返古典、流动性身份、跨国界转向

#### Abstract

People and places are connected. Yu Dafu came to Southeast Asia from China and became a representative of Chinese scholars in the south,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As far as Yu Dafu's literary creation is concerned, and unlike other characterizations of the intercultural turn of literati, his is a return to the classical, which embodi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luidity of identity. During this period, the number of vernacular novels written by Yu Dafu became lesser, while lyrical and newspaper articles became more prevalent. In addition to factors such as his classicism training, the instrumental role of literature and realistic 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Yu Dafu was influenced by the radically different changes between the surroundings of his hometown and Nanyang, as well as the experiences of relatives and friends. Yu Dafu's emotional remnant state is consistent with the attitude of returning to classics, which is also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this special transboundary turn.

**Keywords:** Yu Dafu, return to classicism, fluidity of identity, transboundary turn

\* 钱杉杉 马来亚大学文学暨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电邮地址：qianshanshan@u.nus.edu

\*\* 何启才 马来亚大学文学暨社会科学学院高级讲师。电邮地址：hkeechye@um.edu.my

## 一、前言

二十世纪马华文学研究，在研究文体上存在不均衡性，更多学者关注在白话文之上，而以旧体诗为对象的研究则较少。而就华文旧体诗研究而言，则亦存在分析视角与理论范式单一，以及对于本土华人的诗作关注度高于流寓的南来文人诗作的现象。

二十世纪初期，虽然白话文因新文化运动的推动，成为主要文学形式，然而，旧体诗的文学写作形式亦在马来亚蓬勃发展。据李庆年统计，1881-1941年，新、马地区华文报刊登载旧体诗约有五万首。（李庆年，1998）一方面，旧体诗的写作与白话文不同，要求写作者需具有较高的写作规范与艺术经验，能够遵循独有的格律要求与文学传统。而基于此，旧体诗在在地的存续与否，与旧体诗人之间具有密切的关联。另一方面，旧体诗人间的相互唱和，成立诗社，寄情言史等，对于研究南来与本土的文人关系网络与文学体系，藉此复现适时历史形态与社会风貌，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此基础上，郁达夫旧体诗不仅能体现和其类似的中国南遁文人、本土华人文人所共通的“异族叙事”的困境，即，“这些‘姿态’、‘特色’和‘说法’，共同透露与强化着的正是‘我’在‘异族叙事’中的无法掩饰与消解的一种心态——恐惧。王德威将之称为‘原罪恐惧’：‘移民是否终将沦为夷民’，……‘我是谁’，就‘异族叙事’而言，需要思考和追问的是作为叙事主体‘我’的‘身份’，和‘我’对自我身份的感知。”（王列耀 2007：168）并且，郁达夫的旧体诗，亦与身处同一时期的邱菽园等具有的离散与复归交织的二元经验不同，能够反映流寓文人的真实生动的人物命运与历史风貌。即，郁达夫出走南洋是单向离散，并且在内在情感与政治情感的相互作用下，郁达夫在南洋的旧体诗呈现独特性。

有关郁达夫的现有研究较为丰富，一方面，以学者地域分类，中国学者的研究主要以郁达夫整体的生平经历、历史贡献与文学成就为主，不足在于东南亚时期研究较少。而关于郁达夫在南洋期间的研究，则又多集中在文学层面的杂文评议，以及历史学层面的身故原因探析为主，而对于跨学科研究与不同时期的整体性研究，以及旧体诗领域方面则涉及较少。而东南亚学者的研究，则主要针对具有南来文人身份的郁达夫，对于新马在地的华语文学产生的作用上，以及郁达夫文学写作的南洋风景的建构上，而对于郁达夫在中国及跨域转向涉及较少。另一方面，以研究方向分类，则多集中于以下四个面向，其一，郁达夫文学作品研究与比较研究；其二，郁达夫参与左翼文学运动研究；其三，郁达夫与具体对象的人际关系研究；其四，郁达夫婚姻关系与情感纠葛研究。在此基础上，一部分以郁达夫人际关系与文学作品为对象的研究，将郁达夫的基本认识塑造成为消极、感伤与醉心于情感关系上，而另一部分以郁达夫与郭沫若、鲁迅、左翼作家联盟及在南洋期间所撰写杂文为对象的研究，则将郁达夫拟象成坚定的爱国主义文学斗士。似乎在这一层面上，郁达夫的面相是无法划归的、复杂而矛盾的，然而，多元的特质势必亦具有不变的表征。本文将这一不变的表征，归结为贯彻在郁达夫生命历程始终的“边际”身份与现实因素的相互作用。因此，使郁达夫在南洋的跨国界转向带有双重特质，即重返古典的写作意识与身份认同上的流动性。

## 二、生平经历与“边际”身份的形成

以旧体诗为代表的文学创作，更多的是一种作者内心的自省以及来自外界现实的投射，这一特征在郁达夫之上表露无遗。帕慕克（Orhan Pamuk）指出，“我认为一个作家要做的，就是发现我们心中最大的隐痛，耐心地认识它，充分地揭示它，自觉地使它成为我们文字、我们身心的一部分。”（帕慕克，2006）郁达夫在东南亚的旧体诗创作，是其一生“隐痛”的作用与揭示，既有对于外物的观照，亦有对于自身的反观。郁达夫本名郁文，字达夫，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诗人，生于1896年12月7日，逝于1945年9月17日。纵观郁达夫的生平经历，其一生几近贯穿了民国文学的全部时空，1917-1927年的中国文学界的“百家争鸣”时代，1927-1930年论战分化的“战国”时代，1931-1936年的救亡图存的“中兴”时代，以及1937-1945年的“抗战”时代。（汪兆骞，2019）然而，在中国至东南亚的“迁徙”中，郁达夫具有明显的道德焦虑与大量的旧体诗的写作形式。其重返古典的文学创作，是其在前往南洋前的生平经历与个人选择作用的结果，旨在消除文化上的缺憾感。这一道德焦虑与文化缺憾，形成于其个人经历上的“边际”身份。即，处于抗日战争时期特殊的历史时空条件下，郁达夫既有作为传统文人的特质，清贫风月，注重文学创作、重视文人尊严与人格修养，又有在战争之下文人所需背负的道德使命与外界的预期。而在郁达夫前往东南亚的历史选择中，原有的道德要求转化为自我的道德评判、怀疑与焦虑，构成其流动性的身份认同。

具体而言，在郁达夫的生平经历上，无论是求学修业抑或是任职工作，其皆具有明显的前后分期，即受到“原乡”的“域内”影响与“在地”的“域外”影响的不同阶段。

首先，在郁达夫的求学生涯上前后分期特征明显。前一阶段，郁达夫以接受“原乡”中国传统教育、古典主义文学训练为主。以时序论述，1902年，郁达夫七岁，就读于罗氏自设的私塾启蒙，教师葛宝哉。1903年，就读于魁星阁私塾，教师张惠卿。1904年，郁达夫九岁，就读于春江书院，早慧赋诗。<sup>1</sup>其后，郁达夫数次转学，曾就读富阳县立高等小学、杭府中学、嘉兴府中学、美国教会学堂、蕙兰中学、浙江大学预科等，在杭府中学期间，其与徐志摩、厉麟似等人同班就读。而后一阶段，郁达夫则以留学日本为主，接受“在地”的日、俄、德等国的文学熏陶。1913年，郁达夫同长兄郁华前往日本留学，先后就读于第一高等学校（一高）预科、第八高等学校（八高），东京帝国大学，修读经济学。期间，郁达夫曾与郭沫若、成仿吾等人成立创造社，1922年郁达夫毕业回到中国。

其次，郁达夫工作生涯亦具有中国、东南亚的前后分期。据笔者整理，于中国，郁达夫曾先后担任安徽安庆法政专校英文教师（1922），北京大学统计学教师（1923），国立武昌师范大学中文教师（1924），中山大学中文教师（1926），上海法科大学德文教师，并主持创造社出版部（1926-1927），省立安徽大学中文教师，并发起创立左翼作家联盟，旋即退出（1929-1930），私立之江文理学院中文教师，并

<sup>1</sup> “九岁题诗四座惊，阿连少小便聪明。谁知早慧终非福，碌碌珊瑚器不成。”（郁达夫1988：81）

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3），浙江省政府参议（1934），福建省政府参议兼公报室主任，并访问日、台（1936），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理事长（1937），政治部设计委员以及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务理事及研究部主任（1938），同年前往南洋。于东南亚，郁达夫曾就任《星洲日报》文艺副刊《晨星》，《星洲晚报》文艺副刊《繁星》及《星光画报》文艺版主编，星洲华侨文化界战时工作团兼任干部训练班主任等职务，1940年，创立新加坡南洋学会，1941年，任星华文化界战时工作团团长以及华侨抗敌动员委员会执行委员，1942年，任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同年，新加坡沦陷，郁达夫流亡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于苏门答腊巴爷公务市，郁达夫化名赵廉，创办“赵豫记”酒厂，居住于蔡承达的寓所，因精通日语受当局所命成为日军的日语翻译，利用职务保护援救马来亚华侨及本土抗日人士。日军批捕南下文人，郁达夫协助胡愈之、沈兹九、汪金丁等人撤离印尼。1945年8月16日，郁达夫在电台广播中得知日本宣布战败投降，暗中召集华侨和流亡中国人士，筹备迎接盟军。29日，郁达夫身份暴露，神秘失踪。根据铃木正夫研究，当日，日军杀害于苏门答腊（铃木正夫，1969）。对此，夏志清曾论，“对一个既非共产党员又非极其爱国的作家来说，这无疑是个反讽的结局。”（Hsia 1974: 533）

能够发现，无论是求学修业或是任职工作，郁达夫个人经历上皆具有“本土”与“异域”的区隔与错置，亦具有明显的流亡性。即，无论在求学、在工作，在中国、在南洋，郁达夫皆极少长期居住、任职于一处，而多是积年辗转各处，有时甚至不足月余。

除生平经历上的动荡特质以外，郁达夫在个人情感上亦具有丰沛与游离交织的特征。郁达夫与原配孙荃于1917年订婚，1920年结婚，夫妻感情稳定，据笔者统计，在郁达夫1917至1921年间的诗词中，其与孙荃的唱和诗占比近半。然而，在遇见王映霞后，郁达夫便很快开始了与王映霞的感情。可是，被柳亚子誉为“富春江上神仙侣”的郁、王二人的婚姻，依旧未能顺遂。王映霞不满“妾妇”身份，亦不满郁达夫婚前婚后的区别，“别人都会在文章中称赞自己的妻子、爱人，只有你，一结婚后便无声无息，就像这世界上已经没有了这个人一样。”（王映霞 1992: 153）同时，郁达夫的嗜酒，以及其与其原配夫人孙荃之间的情感亦成为二人的隔阂。1931年春，王映霞身怀郁云七月，因郁达夫饮酒后而发生争吵，郁达夫返回富阳与孙荃同居一星期。郁达夫亦不满王映霞对于钱财与官僚的渴求，又或因其出于最初对二人关系认识的原因：“第一是我们的年龄相差太远，相互的情感当然是不能发生的；第二我自己的丰采不扬——这是我平生最大的恨事——不能引起你内部的燃烧；第三我的羽翼不丰，没有千万的家财，没有盖世的声誉，所以不能使你五体投地的受我的催眠暗示。”（郁达夫 2008: 142）以及二人的生活方式的不同，而使郁达夫产生不信任，使二人的关系造成隔阂。例如，1932年，王映霞同窗故交刘怀瑜到上海旅行，王映霞与其同住一夜，令郁达夫负气出走，写作《她是一个弱女子》或为影射担忧王映霞、刘怀瑜同性之情，并附前言，“谨以此书，献给我最亲爱，最尊敬的映霞。”诸如此类的事件致使二人关系久久不和，而终使二人关系破裂的事件则是王映霞与许绍棣在碧湖同住一夜之事。在王映霞离家后，郁达夫拾到许绍棣三封书信，疑心王映霞越轨行为，遂在《大公报》刊登《寻人启事》，二人关系缓和后，郁达夫再度登报发表《道歉启事》。

前往东南亚前，郁达夫的个人情感上较为丰沛，却具有动荡流离之感，既成为在新加坡郁、王关系破裂的先兆隐患，亦构成其身份认同变化的关键原因之一。

情感上的动荡流离，在郁达夫性格特质与人际往来上亦有所体现。郁达夫极秉持其个人原则，从居所布置上，其清苦，不慕财权的个人原则，即能窥见一二。在郁达夫与孙荃婚后，其手书对联“绝交流俗因耽懒，出卖文章为买书”悬挂于居所。而在与王映霞婚后，郁达夫亦在房间悬挂蔡元培手书对联，“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以示文人风骨。郁达夫常言，“我们无产者惟一可靠的财产，便是自己的身体。”郁达夫以文人自居，一生清苦，行事作风则有较为鲜明的个人色彩。根据梁实秋的回忆，“见到郭、郁、成几位，我惊讶的不是他们生活的清苦，而是他们生活的颓废，尤以郁为最。……后来郁达夫到清华来看我，要求我两件事，一是访圆明园遗址，一是逛北京的四等窑子，前者我欣然承诺，后者则清华学生夙无此等经验，未敢奉陪。”（梁实秋 1992：142）又根据王映霞回忆，“郁达夫有过人的智慧，有绝世的才华，可是他每当脑筋一转，脾气一发，他就不会顾及前后，自己控制不住自己，他很知道这一件事是做错了，他亦了解这件事情会在我的精神上留下难以消除的伤痕。”（王映霞 2008：92）

郁达夫将“文人”定义为，“能说‘失节事大，饿死事小’这话而实际做到的人，才是真正的文人。”在前往东南亚前，其行事作风皆是如此。郁达夫多因其固守文人行为准则与同僚发生不和，譬如，1922年郁达夫回到中国后，即在《创造季刊》上发表文章，讽喻胡适。1926年，郁达夫又因郭沫若、成仿吾等好友投入于蒋介石政府工作与之产生分歧，强调文人需秉持独立文人的品格，12月14日，郁达夫称，“我不屑与俗人争，我尤不屑与今之所谓政治家争，百年之后，容有知我者，今后当努力创作耳。”（胡从经 1984：31）指责好友投身于政治的行为。为此，郁达夫离职返沪，经营创造社。在上海工作期间，郁达夫又因发觉周全平、叶灵凤、潘汉年、成绍宗等“小伙子”借“创造社”为名发表情爱书刊获取收益，要求剥离《幻洲》杂志，致使潘汉年等人辞职投奔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不满。1927年，郁达夫退出创造社，与鲁迅来往密切。离开创造社之际，其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短篇小说《二诗人》，讽喻王独清等创造社成员，创造社因此发起“倒郁”声浪。1930年，鲁迅推荐郁达夫成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发起者之一，然而因郁达夫与徐志摩交好，在左联第四次全体大会上被左联开除，根据郑伯奇记载，“会上有人提出这样的意见：郁达夫对新月社的徐志摩说：‘我是作家，不是战士。’向左联的敌人公然这样表示，等于自己取消资格，应该请他退出。一时群情激动纷纷表示赞成。”（郑伯奇 1982：16）

郁达夫前期形塑的坚定的抗日情怀，亦是其后期在东南亚重返古典与流动性身份形成的关键因素之一。其抗日情结的固化，关键时间节点在于1936年郁达夫出访日本与郁母离世。1936年，郁达夫应陈仪之邀入闽。前文已述，郁达夫对参与政事兴致索然，其应陈仪邀约原因，首先，在郁达夫一方，此行原因在于其经济困顿，陈仪好友葛敬恩荐举郁达夫，郁达夫能够通过任职获得资助。而在陈仪一方，原因则是陈仪与蒋介石期望借郁达夫等“日本通”，声援日本亲中派，与主战派抗衡。由此，郁达夫致信陈仪：“慕陈氏治绩，欲来闽观光，如得一席之地以赞盛治，深以为幸。”陈仪回信，“若有闽游之意，无任欢迎。”当年2月4日郁达夫抵达福州，6日，正式担任福

建省政府参议一职，6月，担任福建省政府公报室主任。根据1936年2月6日，郁达夫《闽游日记》载，“晋见主席陈公，畅谈移时，言下并欲以经济设计事相托，谓将委为省政参议，月薪三百元，我其为蛮府参军乎？”（郁达夫 2008：405-535）而根据其子郁飞记载，“就我所知，从一九三二年移家杭州以后，父亲的政治态度一直是消沉的。……可是，他重新投入时代的洪流也是在福建——即1936年冬的日本之行。那次行程据他说是应日本各社团及学校之聘去东京讲演的，但实际上负有一项秘密使命：向亡命日本已达十年的郭沫若转致南京国民党政府为抗日战争终将爆发而要郭伺机回国之意。”（郁飞 1996：356）1936年11月，郁达夫访日，期间拜会郭沫若、佐藤春夫等好友。郁达夫行程计划在日演讲三场，但因第二场涉及批判日本军国主义，第三场演讲被迫取消。1936年12月，郁达夫返回台湾，次年1月，返回福州，3月代郭沫若申请回国，蒋介石批准，7月郭沫若回到中国，郁达夫前往上海迎接。同年12月，浙江富阳沦陷，郁母不堪受辱，饿死山上。郁达夫福州守孝，亲书，“此仇必报，无母何依”悬挂于堂前，足不出户月余，此后笔伐日军侵华。

郁达夫在因其坚持文人原则与救国之志，同故友决然反目的同时，对于旧友亦存些许的温情。以佐藤春夫为例，1921年，郁达夫通过田汉结识佐藤春夫，1927年，佐藤春夫携夫人及侄女佐藤智慧子访华，田汉冷落，郁达夫则念及旧情，对佐藤春夫盛情款待。佐藤智慧子回忆，“郁先生对我们招呼得最亲切，因此印象最深，也最为怀念”。再如周作人，郁达夫曾评价，“现在颇有些人，说周作人已作了汉奸，但我却始终仍是怀疑。所以，全国文艺作者协会致周作人的那一封公开信，最后的决定，也是由我改削过的；我总以为周作人先生，与那些甘心卖国的人，是不能作一样的看法的。”（郁达夫 1990a：299）而在马来亚期间，郁达夫亦曾诗评汪精卫：

飞车高卧过垂虹，草驿灯昏似梦中。  
许国敢辞千里役，忍寒还耐五更风。  
神州旧恨遗徐福，南粤新谣怨蒯通。  
卷土重来应有日，俊豪子弟满江东。<sup>2</sup>

需要注意的是，郁达夫这一对旧友的温情是有限度的。尤其在亲族亡故的影响下，郁达夫抗日情怀坚定，凌驾于个人感情之上，成为后期在东南亚流动性身份形塑的重要原因之一。夏衍评价郁达夫，“达夫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爱国是他毕生的精神支柱。”以佐藤春夫为例，在郁达夫的努力下郭沫若离日回到中国，佐藤春夫因支持日本的大东亚共荣论，就郁、郭一事，杜撰短篇小说《亚细亚之子》，将二人隐含为反面人物形象，配合日军侵华战争。故此，郁达夫撰写杂文《日本的娼妇与文士》笔伐

<sup>2</sup> “方修在《郁达夫佚文集》（方修、连奇编，新加坡一九八四年六月版）序言中说：‘《郁达夫选集》的诗词部分，在编校上两点始终使我深感不安的疏忽。其一是收入了那首《十八年元旦因公赴槟榔屿，闻有汪电主和之谣，车中赋示友人》，发排时没有留意，出书后始知这诗发表当时很引起李铁民的不满，指出郁达夫不应如此为汪精卫辩护，于是两人发生激烈的争论，后来郁发觉了确是自己的错误，曾矢言将来如有机会编印诗集，必定将这一首删去；而现在我们却将它辑录传世，这显然是大大违反了诗作者本人的遗志的……’”（郁达夫 1988：225）

故友，言辞激烈，“至于佐藤呢，平时却是假冒清高，以中国之友自命的。他的这一次的假面揭开，究竟能比得上娼妇的行为不能？我所说的，是最下流的娼妇，更不必说李香君、小凤仙之流的侠伎了。”（郁达夫 1985：746）佐藤春夫则直接将《亚细亚之子》主人公郑某修改为郁某以示回应。再如，郁达夫撰文批判汪精卫组建附日政府，“痛恨之中，尤觉得切齿的，是虽称这些烈士的同胞之中，竟有一个生长在烈士们买股之乡的汪逆”，“南京的傀儡戏，无论在国际友邦那里或在我国同胞以上中是完全不值得一提的虫鼠狗彘的行为”（郁达夫 1990b：85）。

总体而言，郁达夫“边际”身份的形成，并非全然由客观因素所致，在很大程度上，是其性格特征有意或无意的促成的结果。郁达夫非“安定”的过往生活、工作、情感经验写照、固守文人“清流”的准则、坚定的反日情结、对故国、故友留有的温情，是促生其在南洋跨越国界而转向古典，且具有流动性身份特质的重要因素。郁达夫对于马华文学的发展影响深远，1938年之后，郁达夫在中国“缺位”，在东南亚“复现”，由于寓所的频繁变动，郁达夫在东南亚的“迁徙”特征亦较为明显，创作上则具有重返古典与流动性身份二个方面的表征。“孤独”始终缠绕着郁达夫，这一“孤独”既是个人的，又是历史的，“流寓”则是促生其文学创作转向的重要因素之一。“人生最不易得的是闲暇，更不易得的是患难”（胡适，1937），闲暇与患难的特质，于郁达夫在东南亚期间表露明显。跨域的“迁徙”使作家的文学创作更为深刻，诸如离开美国远居巴黎的海明威，又如离开哥伦比亚远居墨西哥的马尔克斯。爱国情怀与故土危机，亦使离开中国的郁达夫，在东南亚期间，成为土地上的“他者”，在其“观看”异域的过程中，流动性身份的特征则使其亦具有反观自我的可能性。郁达夫重返古典而创作的旧体诗词，则是其对于原乡情感投射的体现。

### 三、异乡的流亡者与旧体诗的复归

总体而言，中国古往今来不乏有文人南渡的现象，以郁达夫为代表的二十世纪的南来文人，对于马华文学产生重要影响。在历史因素的作用下，郁达夫等战前的文人南渡，大多在具有文化身份的同时，兼具政治色彩，且以遭逢国难，救亡图存的政治目的作为南来的第一要义。亦因此，南来文人主业的文学活动大多具有政治考量。就郁达夫而言，其对于政治层面的反映广泛体现在南洋的白话文报章评论上，例如对于敌我战局形势的判断，对于民众守土抗日的鼓励等等，包括其撰写的一些科普性质文章，亦具有现实关照，或出于服务政治诉求的目的。以郁达夫的《犹太人的德国文学》为例，其在文中强调德国文学的发展与犹太人不可分割的渊源，“就是现在的德国文学，世人的所以还知道有德国文学的存在的，也都是靠那一批犹太作家在那里维持的。”（郁达夫 1985：778）

而在用于个人情感抒发层面上，郁达夫的文学创作，则与此前在中国写作白话小说为主的文学姿态有较大不同，其在东南亚的写作，主要以现实层面的报章评论与寄情抒怀层面的古体诗词为主。因此，在写作层面，郁达夫具有跨国界转向的表现。需要说明的是，此处的跨国界转向，非是指泾渭分明的截然对立的特殊转向，而是具有较为明显的文学写作区别的一般转向。换言之，郁达夫在中国亦曾写作旧体诗词，只

是相较而言，参照下表1，郁达夫在中国创作大量白话小说，但是在东南亚期间郁达夫抒怀心志的文学作品，则主要是旧体诗词，极少写作白话小说。

表1：郁达夫白话小说<sup>3</sup>

| 序号 | 写作时间       | 题名           | 类型   |
|----|------------|--------------|------|
| 1  | 1920       | 《银灰色的死》      | 短篇小说 |
| 2  | 1921.5.9   | 《沉沦》         | 短篇小说 |
| 3  | 1921.6.14  | 《友情照病》（《胃病》） | 短篇小说 |
| 4  | 1921.7.27  | 《南迁》         | 短篇小说 |
| 5  | 1922.2     | 《茫茫夜》        | 短篇小说 |
| 6  | 1922.4.28  | 《怀乡病者》       | 短篇小说 |
| 7  | 1922.7     | 《风铃》（《空虚》）   | 短篇小说 |
| 8  | 1922.7     | 《秋柳》（初稿）     | 短篇小说 |
| 9  | 1922.8.4   | 《血泪》         | 短篇小说 |
| 10 | 1922.11.20 | 《采石矶》        | 短篇小说 |
| 11 | 1923.4.6   | 《莛萝行》        | 短篇小说 |
| 12 | 1923.6.23  | 《青烟》         | 短篇小说 |
| 13 | 1923.7.15  | 《春风沉醉的晚上》    | 短篇小说 |
| 14 | 1923.8.16  | 《秋河》         | 短篇小说 |
| 21 | 1923.9     | 《离散之前》       | 短篇小说 |
| 15 | 1923.9.10  | 《落日》         | 短篇小说 |
| 16 | 1923.12.1  | 《人妖》         | 短篇小说 |
| 17 | 1924.10    | 《秋柳》（改作）     | 短篇小说 |
| 18 | 1924.8.14  | 《薄奠》         | 短篇小说 |
| 19 | 1924.12.7  | 《十一月初三》      | 短篇小说 |
| 20 | 1925.5.17  | 《寒宵》         | 短篇小说 |
| 21 | 1925.5.19  | 《街灯》         | 短篇小说 |
| 22 | 1926.3.16  | 《烟影》         | 短篇小说 |
| 23 | 1926       | 《蜃楼》（未完）     | 中篇小说 |
| 24 | 1927.1.10  | 《过去》         | 短篇小说 |
| 25 | 1927.1.18  | 《清冷的午后》      | 短篇小说 |
| 26 | 1927.11.7  | 《二诗人》        | 短篇小说 |
| 27 | 1927.12.19 | 《迷羊》         | 中篇小说 |
| 28 | 1928.9     | 《逃走》（《孟兰盆会》） | 短篇小说 |
| 29 | 1929.1     | 《在寒风里》       | 短篇小说 |
| 30 | 1930.7     | 《纸币的跳跃》      | 短篇小说 |
| 31 | 1930.8     | 《杨梅烧酒》       | 短篇小说 |

<sup>3</sup> 此表系笔者根据郁达夫相关著作集及《创造周报》等报章资料整理汇编而成。

|    |           |                  |      |
|----|-----------|------------------|------|
| 32 | 1930.10.1 | 《十三夜》            | 短篇小说 |
| 33 | 1931      | 《蜃楼》             | 中篇小说 |
| 34 | 1932.3    | 《她是一个弱女子》（《饶了她》） | 中篇小说 |
| 35 | 1932.6    | 《马缨花开的时候》        | 短篇小说 |
| 36 | 1932.9    | 《东梓关》            | 短篇小说 |
| 37 | 1932.10   | 《碧浪湖的秋夜》         | 短篇小说 |
| 38 | 1932.10   | 《迟桂花》            | 短篇小说 |
| 39 | 1932.12   | 《瓢儿和尚》           | 短篇小说 |
| 40 | 1933.5.20 | 《迟暮》             | 短篇小说 |
| 41 | 1935.2    | 《唯命论者》           | 短篇小说 |
| 42 | 1935      | 《出奔》             | 中篇小说 |

郁达夫早在1929年即有前往南洋的愿望，马华作家温梓川求学期间曾在汪静之居所曾请教郁氏其所作带有南洋风貌的《竹枝词》，郁达夫不解诗中“榴槿”“娘惹”其意，温梓川解释后，郁达夫感慨，“啊！南洋这地方，有意思极了。真是有机会非走走不可。”并向汪静之解释，“斯蒂文生的晚年就是在太平洋的一个小岛上渡过的，他在那里就写了不少非常有意义的作品。”（温梓川、钦鸿 2006：80-81）

郁达夫流散南洋，重返古典，并非代表他在东南亚期间不使用白话文进行写作。恰恰相反，基于工作原因，郁达夫在东南亚写作了大量结合时政的守土爱国的评论杂文、散文、文艺杂论等白话文的报章评论，从其就职《星洲日报》、《星洲晚报》期间完成的报章稿件中，即能窥见一二。既如此，缘何“独在异乡为异客”的郁达夫，用于个人的抒情表意的文学作品中则鲜有白话小说，而主要是古诗诗词？

究其原因，郁达夫在旧体诗上的复归，表层因素有四。其一，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空条件下，新文学方兴未艾，在情感抒怀的层面，具有局限性。即，与古典文学相较，新文学目的性、工具性更强，是以普及民众，开启民智为主要功用。其二，白话小说需要的构思与心力较多，并且表词达意需要更好的斟酌，需要较长的创作时间，而担任《星洲日报》、《星洲晚报》、《星洲画报》文艺版面主编的郁达夫，在新加坡共写作四百余篇报章评论等，业余时间较少。此外，郁达夫亦有较多杂务，缺乏白话小说的写作时间，创作精力亦不充分。其三，对于郁达夫而言，与白话小说相较，旧体诗写作是极好的规避在东南亚产生现实政治上问题的方式。其四，自小接受古典主义训练的郁达夫，更为熟悉自己幼时接受的文学写作形式训练，面对庞大的情感需求时，以白话文的文学形式进行表达并未纯熟，而经历旅日期间即多使用旧体诗词进行思乡抒怀的郁达夫，在使用旧体诗表情达意之上更为熟练。综上所述，旧体诗的写作形式更为契合郁达夫的救亡中国的心境，且符合时间精力有限与现实条件限制，并且，出身传统文学训练的郁达夫，在旧体诗的写作经验上更为丰富。

更为关键的则是深层因素，即，受到现实影响与过往经验所造成的，郁达夫的流动性身份的特征作用的结果。具体而言，首先，郁达夫在东南亚的流动性身份的产生，是其个人的亲族伦理关系变动的作用。参照下表2，郁达夫父亲早亡，其与长兄郁曼

陀、次兄郁养吾由母亲陆氏抚养长大，长姊郁凤珍为叶氏童养媳。中国古典文学长期以父母、宗亲为主体的叙事模式与父亲身份的缺位，使郁达夫尤为尊重母亲与长兄，然而在旅居东南亚前后，却又因日军侵华的影响，造成郁达夫母兄的接连亡故，成为郁达夫流动性身份的再造重塑的重要原因。而另一方面，在夫妻关系上，郁达夫在南洋远离原配孙荃，与次妻王映霞前期在中国的纠葛，于东南亚延续，二人终于1940年在新加坡离婚。此后，郁达夫后与李晓音及子郁飞同居，在前往苏门答腊后，1943年又与何丽有结婚。其在南洋期间频繁更变的夫妻关系，是郁达夫前期在中国期间所不具备的特征，亦是其情感上的遗民状态生成的重要因素。

表2：郁达夫亲属关系<sup>4</sup>

| 姓名                     | 身份   | 生卒年       | 生平经历                                                                                           |
|------------------------|------|-----------|------------------------------------------------------------------------------------------------|
| 戴氏                     | 祖母   | 1838-1923 |                                                                                                |
| 郁士贤（名郁企曾，字士贤）          | 父亲   | 1863-1898 | 私塾教师，兼任中医，后任职于富阳县衙，早亡。                                                                         |
| 陆氏                     | 母亲   | 1866-1938 | 1937年12月，日军侵占富阳时，不忍受辱而饿死于山上。                                                                   |
| 郁曼陀（名郁华，幼名廉生，原名庆云，字曼陀） | 长兄   | 1884-1939 | 早年官费日本留学，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法政大学，曾先后任职外交部、京师审判厅推事、沈阳最高法院刑庭庭长等职，1939年11月，遭日伪特务狙击，三枪殒命，时任上海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庭长。 |
| 郁养吾（名郁浩，幼名浩生，字养吾）      | 次兄   | 1891-1971 | 毕业于北京医专，1919年考取第二届文官高等考试，分派至海军部工作，后回乡行医，1971年逝世。                                               |
| 郁凤珍（幼名阿凤）              | 长姊   | 1894-1920 | 叶氏童养媳。                                                                                         |
| 孙荃（原名孙兰坡）              | 妻    | 1897-1978 | 幼读私塾，1920年嫁郁达夫，郁达夫逝世后，嘱子女勿忘父殉国之志。                                                              |
| 王映霞（名王旭，原名金宝琴，字映霞）     | 妻    | 1908-2000 | 毕业于杭州女师，1928年嫁郁达夫，1940年与郁达夫离婚，1942年嫁钟贤道。                                                       |
| 李晓音（李筱瑛）               | 同居关系 | 1918-无考   | 毕业于暨南大学，英方新闻部广播员，1941年撤至爪哇，后至印度，与泰籍职员再婚，后与张弢再婚。                                                |
| 何丽有（原名何如转，后名陈莲有）       | 妻    | 1921-无考   | 生父姓何，因家贫幼时为一陈姓人家收养，带至印尼，1943年嫁郁达夫，1949年再婚。                                                     |

<sup>4</sup> 此表系笔者根据郁达夫与亲友日记、回忆文章、档案文献等相关资料整理而成。

面对故国的沦丧，母亲、长兄的凄楚离世，以及夫妻关系上的动荡变化，一方面，坚定了郁达夫的抗日情结与加深故土眷恋，而写作旧体诗则是其对于原乡复归的一绝好的方式。另一方面，又由于远离故国，亲族逝去，郁达夫情感上的遗民情感在此期间则更为明显。根据1939年郁达夫发表的旧体诗作《抵槟城后，见有饭店名杭州者，乡思萦怀，夜不成寐，窗外舞乐不绝。用谢枋得〈武夷山中〉诗韵，吟成一绝》中载：

故园归去已无家，传舍名留炎海涯。  
一夜乡愁消未得，隔窗听唱后庭花。  
(郁达夫 1988: 226)

又如1940年4月，郁达夫示南华女校校长姚楚英诗作《题姚楚英诗册》载：

文物中原剩劫灰，竭来异地育英才。  
木兰心事何人会，南海舟中一剪梅。  
(郁达夫 1988: 237)

在东南亚，郁达夫有着“故园归去已无家”与“文物中原剩劫灰”的感叹，可见郁达夫对于归去故园有所向往与乡愁，遗民状态则亦有所显露。而至于郁达夫一直未归“故园”的原因，依据日军占领南洋的前后时间阶段，分为二个面向。其一，缘何郁达夫在新加坡旅居期间未选择回返中国？在郁达夫旧体诗中，其前往南洋“投荒”的意象非属一次，而是多次复现。譬如，在1939年2月7日，郁达夫亦将其前往南洋一行称为如屈原流放一般的“投荒万里行”：

投荒大似屈原游，不是逍遥范蠡舟。  
忍泪报君君莫笑，新营生圻在星洲。  
(郁达夫 1988: 228)

至于其“投荒”南洋的原因，根据1940年，郁达夫示胡浪漫的旧体诗《珍珠巴刹小食摊上口占，和胡迈诗原韵》载：

月缺花残太不情，富春江上暗愁生。  
如非燕垒来蛇鼠，忍作投荒万里行？  
(郁达夫 1988: 241)

郁达夫“垂老投荒”的原因，其在诗作中概括为保卫“燕垒”，即出于为维系保护婚姻与家庭的目的，因此，郁达夫携妻带子取道南洋，追求一并非逍遥自在，却能较为安适之所。郁达夫曾评价在南洋的生活，与其前的“风尘仆仆”，“魂梦摇摇”的流离颠沛相较，“真像是在做梦”。又根据1940年初，郁达夫旧体诗作《咏星洲草

木——题黄葆芳君收藏册页》，郁达夫旅居新马期间，南洋生活诚如其所想一般安宁随适：

星洲草木最繁华，年去年来绿满涯。  
月里风车椰子树，林中火焰凤凰花。  
鸡头新剥尝山竹，粉颊频回剖木瓜。  
难禁榴梿香气味，有人私典锦笼纱。  
(郁达夫 1988: 232)

然而，根据上表2不难发现，郁达夫对于夫妻关系的维系，并未因其前往南洋便有所转圜，相反的，郁、王的婚姻于1940年即草草结束。此后郁达夫结识李晓音，然而二人的关系亦匆匆收场。在二人同居期间，由于郁飞与李晓音不睦等原因，李晓音后搬离郁达夫寓所。在年少的郁飞看来，“我本能地不愿眼前唯一的亲人对我的爱有所分散，更不愿另一个人成为旁人笑谈中的我的新妈妈，尽管这个女性我挑不出多少不是之处，而且她对我也一再表示好感和关切。”（郁飞 1996: 372）因此，“大概一九四二年元旦以前吧，李小瑛搬出我们家了。……王任叔同志在同一篇回忆里提到父亲对他说：我儿子不赞成哩。……可我知道，自后两人来往并未减少，工作上和个人间的密切关系反而有增无已，直至两人分别撤出危城之时。”（郁飞 1996: 374）此后，郁、李又因未来规划不同，终天各一方。流亡苏门答腊期间，郁达夫1942年春写作的旧体诗《乱离杂诗十二首》前八首，即为感怀李晓音所写。

虽然，在夫妻关系的维护之上，郁达夫未能实现前往南洋的初衷，但是在与子女关系上，郁达夫对子女的关怀有加。根据下表3，郁达夫一生共有子女11人，二子一女早夭，遗腹女一人。对于居住在郁氏本家的孙荃所生子女，郁达夫亦有所看顾。据陆费澄回忆孙荃，“这个一生唯一的婚姻不知给孙荃留下了多少幸福，多少悲哀和多少追悔的回忆。但是不管怎样，孙荃心日中的郁达夫总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丈夫和父亲。”（陆费澄 1996: 382）而又据王映霞回忆，在郁亮早夭前，郁达夫与王映霞日日照看，“我们日日请郁达夫留日朋友、儿科名医钱潮来给他诊治，因为缺少药物，他还是离开了人间。”（王映霞 2008: 127）二人前往新加坡时，对于未居郁家的王映霞所生子女，郁达夫给予了较为充分的安排，亦关照亲友多帮助看顾。长子郁飞随父母一同前往，而次子郁云、三子郁荀则交由廖元善照料。在南洋，郁达夫对于郁飞的关怀备至，尤其在王映霞婚姻破裂之后。郁飞曾回忆父亲，“一是我生病发烧之后，嘴里没味，因而说起在家乡常吃的枇杷多么鲜美。明知热带尽多佳果，这种温带水果却是无从觅得的，我不过是随口说说。谁知第二天父亲进门就说：‘我给你带枇杷来了。’我接过两个罐头，不知说什么是好。”（郁飞 1996: 367）

表3：郁达夫子女关系<sup>5</sup>

| 姓名        | 身份 | 生卒年       | 生平经历                                   |
|-----------|----|-----------|----------------------------------------|
| 龙儿        | 子  | 1922-1926 | 母孙荃，早夭。                                |
| 郁黎民（原名洁民） | 女  | 1925-     | 母孙荃。                                   |
| 郁天民（幼名阿熊） | 子  | 1926-1987 | 母孙荃。                                   |
| 郁正民（幼名胖妞） | 女  | 1927-2004 | 母孙荃。                                   |
| 郁飞（幼名阳春）  | 子  | 1928-     | 母王映霞。随父母前往南洋，战时郁达夫友人太太卢蕴伯带郁飞回国，陈仪收养。   |
| 郁静子       | 女  | 1929-1931 | 母王映霞。早夭。                               |
| 郁云（幼名殿春）  | 子  | 1931-     | 母王映霞。父母前往南洋，廖元善收养，王映霞改嫁，郁静民接回郁氏，郁养吾抚养。 |
| 郁亮（幼名耀春）  | 子  | 1933-1934 | 母王映霞。早夭。                               |
| 郁荀（幼名建春）  | 子  | 1936-     | 母王映霞。父母前往南洋，廖元善收养。                     |
| 郁大雅（亚）    | 子  | 1944-     | 母何丽。何丽改嫁，蔡清竹收养，1960年，胡愈之介绍回国。          |
| 郁美兰       | 女  | 1945-     | 母何丽。遗腹女。何丽改嫁，蔡清竹收养，1960年，胡愈之介绍回国。      |

虽然这一对于“燕垒”维系是不成功的，然而，郁达夫在马来亚期间，确因出于维护婚姻与家庭的考量，未选择回到中国。但是，缘何在新加坡沦陷前，郁达夫仍未选择回到中国，而是前往苏门答腊流亡？就这一原因，其子郁飞说明，“英国当局因力量不足，宣布只有老弱妇孺可优先撤离。即使无此限制，父亲也不愿去到国民党统治下的大后方，原因早在一年多前给林语堂的信里就有所透露：‘弟平时为人，主张行动，似有不为当局所谅解处；……何况开战后重庆当局派到新加坡担任联络的文（叶公超）武（郑介民）大员早已示意英方，南来的文化界人士任其陷入敌手。情形同香港九龙沦陷前如出一辙，但身陷港九的大批文化界人士因东江纵队奉党中央命英勇机智地抢救，几乎全部脱险，星岛则无此条件。他首先想到的办法就是匿名蛰居。’”（郁飞 1996：376）在这一层面上，郁达夫选择离开新加坡前往苏门答腊，居于东南亚，成为异乡土地上的流亡者。根据胡愈之《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一书，郁达夫的流亡自新加坡，至荷属吉里汶岛，石叻班让，望嘉丽，保东村，帕干巴鲁，巴爷公务。（胡愈之，1946）郁达夫在苏门答腊期间化名赵廉，开办“赵豫记”酒厂，至于名称的由来，好友胡浪漫认为，“其取赵姓，当非赵为百家姓之首之故，而是含有完璧归赵之期望。……至于名廉，则怀有廉颇未老，壮心未已，尚堪充任战斗之意。……酒

<sup>5</sup> 此表系笔者根据郁达夫与亲友日记、回忆录等相关资料整理而成。

厂取名豫记，显然采取豫让为智伯复仇故事，其开设酒厂，正等于豫让漆身吞炭，目的在掩饰身份耳。……因其自比豫让，应存有刺客之心。凡此固为推想，然不中亦不远矣！”（胡浪漫 1986：33）

郁达夫有“荆轲刺秦”志向和理想，然而在苏门答腊期间，受到现实因素的打压，其身份上的游离性体现尤为明显，长期的动荡在一定程度上耗损了郁达夫的精神，1944年，郁达夫写作《胡近来诗，会有所感，步韵以答》载：

故人横海寄诗来，辞比江南赋更哀。  
旧梦忆同蕉下鹿，此身真似劫馀灰。  
欢联白社居千日，泪洒新亭酒一杯。  
衰朽自怜刘越石，只今起舞要鸡催。  
（郁达夫 1988：271）

郁达夫感叹“此身真似劫馀灰”，诗句充斥着忧伤与压抑的哀清之感，往日的“旧梦”与如今的“衰朽”二相映照，加剧其流动性身份的产生。郁达夫在苏门答腊的生活，似与明末清初的钱牧斋，及晚清流散于民国遗民文人有所呼应。郁达夫曾于1931年离开富阳老家给孙荃留言，“钱牧斋受人之劝，应死而不死，我受人之害不应死而死，使我逢得杨爱则忠节两全矣！”杨爱即钱牧斋爱妾柳如是本名。郁达夫1918年曾写作旧体诗《钱牧斋》，在一定程度上却成为其后期自身的谶言：

虞山才力轶前贤，可惜风流品未全。  
行太卑微诗太俊，狱中清句动人怜。  
（郁达夫 1988：89）

郁达夫对于钱牧斋“力轶前贤”的文采及行事风流的评价，以及来自时代洪流压迫的乱世苟活之状，至崇祯十年，钱谦益因事下刑部狱，留《狱中杂诗三十首》于后世，与郁达夫在苏门答腊经历一般不二。在期待新文学、白话文的南洋，郁达夫选择以颓唐风流与古典诗作一抒心中的苦闷悲戚。颓废、反抗与痛苦，使郁达夫的文字脱离本身，成为民族命运与个人流亡的发声者。在苏门答腊期间，郁达夫对于家庭亦多有关照，然而其看重则不似从前，郁达夫其妻易名为何丽有，意为何丽之有，其子郁大雅（亚）的得名，则为讽刺日本大东亚共荣所取。相比之于郁达夫此前曾为孙荃名讳赠诗，有所差异，曰：

赠君名号报君知，两字兰荃出楚辞。  
别有伤心深意在，离人芳草最相思。

郁达夫南来的期望是，在东南亚“把南洋侨众的文化，和祖国的文化来一个有计划的沟通”，“在海外先筑起一个文化中继站来，好作将来建国急进时的一个后备

队”（郁达夫 1990b: 530）。在东南亚期间，郁达夫参加各类抗日活动，出席文艺工作者大会，发表《为保卫马来亚告侨胞书》，其亦曾对好友刘海粟言，“万一敌军侵入新加坡，我们要宁死不屈，不能丧失炎黄子孙的气节，做不成文天祥陆秀夫，也要做伯夷叔齐。”然而，受到现实因素的影响，郁达夫多流连于烟花场所，尤其在流亡于苏门答腊期间。（张紫薇 1984: 344）在苏门答腊时期，郁达夫受雇于日本宪兵部，丧乱的流亡使其常陷于自我怀疑之中，身份认同失序。根据王任叔的回忆：“第一个晚上达夫和我便在正厅前的客厅里细谈了半夜。我对这一个有才能的作家，很想唤回他对于过去的记忆，称誉他文学事业上的成就，希望他能够自爱，能够振作，能够重整旗鼓。这称誉似乎使他深深感叹了。‘我以为自己完结了的人，照你说，我还可以写些什么吗？’他惊喜地问。……‘我不能回国，蒋介石是要杀我头的。我已经做了汉奸了呀！’‘但你不能算是汉奸。’‘真的，不是汉奸？’达夫在屋子里踱了起来。……‘我现在也戒酒，在宪兵部，我绝对不喝一口。’我相信他是实话。”（王任叔 2006: 74-75）对此，梅其瑞认为，这一时期的郁达夫，“他不是一位神圣英雄，也不是特别的爱国者。他仍保存众所共知的原本性和一贯作风——不是十全十美，并反复无常，但非常诚恳待人。他一生中，对日本和日本人，始终怀有复杂感情，他喜欢许多日本的为人处世方针，但他害怕日本对恶事的潜在力。”（梅其瑞 1984: 333）

至于郁达夫在南洋期间写作旧体诗的用途，根据下图1所示，能够发现其所写旧体诗作主要是以留诗赠友或与友人唱和为主，约有53篇，其次为思乡，约10篇，而后则是纪念、记游、感怀等。在面对陌生的而“举目无亲”的东南亚，具有原乡情怀的早期华人移民成为“远赴他乡”的郁达夫新的社会连带。这一跨域移民形成的族群信任纽带，即为族群社会资本。而在全新的非安定的社会环境下，对于郁达夫而言，一方面，全新的地域使其寄望原乡的社会资本减弱，而新的族群社会资本增强。另一方面，由于夫妻关系的破裂与母兄子女的离散，使其具有较大的情感需求。郁达夫古体诗创作，反映其在结友方面较大情感投射。而对于唱和言诗的另一方而言，一方面，就本土华人而言，亦因文化身份上的“多重归属”而使其对郁达夫具有情感回应，使郁达夫在本土华人之上，重新找寻到归属感，“船到西码头就遇到了一次迎候者的袭击，黄领事、胡总经理、胡主笔、邓曾张三先生，此外还有A老兄、B大哥，真令人要下几点‘到处论交齐管鲍，天涯何地不家乡’的感泪。”（郁达夫 1982: 218）另一方面，就其他旅居东南亚的中国文人而言，现实上的流寓属性与离散经验，使其对于郁达夫的离散感性感同身受，亦愿意与之进行文学创作上诗歌来往唱和。结合下图2，能够发现，郁达夫在南洋旧体诗作主要是示友之用，而其所和诗、赠诗友人，大多为东南亚华人领袖、本土文人及旅居南洋的中国文人，亦有部分为与身处中国的政界、文化界人士的诗歌答对。

事实上，在目的性功用之外，郁达夫在东南亚期间的示友、记游、纪念、感怀等旧体诗中，带有的思乡情感意象多占主体。比如，1938年末，郁达夫方才抵新加坡，其示“南国诗人”李西浪诗作《小草》中载：

生同小草思酬国，志切狂夫敢忆家。  
张禄有心逃魏辱，文姬无奈咽胡笳。

宁辜宋里东邻意，忍弃吴王旧苑花。  
不欲金盆收覆水，为谁憔悴客天涯。  
（郁达夫 1988：2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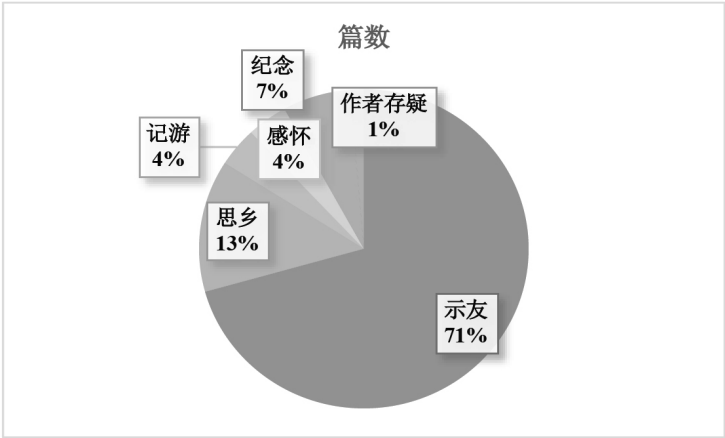


图1：郁达夫南洋古体诗作类别<sup>6</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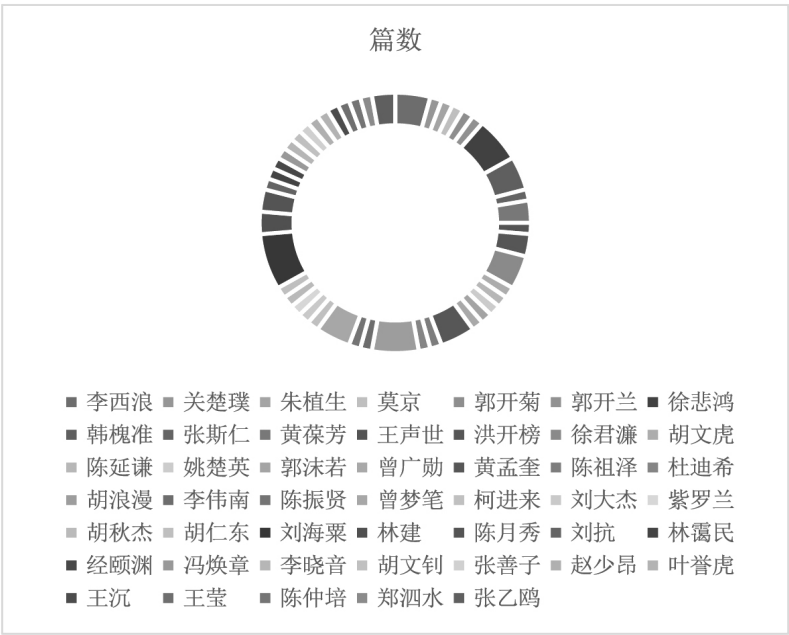


图2：郁达夫示友诗作对象<sup>7</sup>

<sup>6</sup> 此图系笔者据本文表4内容整理而成。

<sup>7</sup> 此图系笔者据本文表4内容整理而成。

又如，1945年春，郁达夫最后传世诗作，示张乙鸥《题新云山人画梅》一诗：

十年孤屿罗浮梦，每到春来辄忆家。  
难得张郎知我意，画眉还为画梅花。  
(郁达夫 1988：261)

郁达夫以“决心去国，上南洋去海外宣传，若能终老炎荒，更系本愿”为因南下，同时积极介入马华文学世界，曾写作《南洋文化的前途》、《马华剧运的进展》、《一年来马华文化的进展》、《几个问题》等杂文评议，而在郁达夫与身居中国的友人的诗歌往来中，其对于彼时中国时局的认知与表述，亦有较为明显的展现。例如，1941年6月，其为冯玉祥所作的《冯焕章先生今年六十，万里来书，乞诗为寿。戏效先生诗体》一诗，即显示郁达夫对于国共内战的“萁豆相煎”“同室操戈”的反对：

马二先生真好汉，能屈能伸能苦干。  
昔从西北练精兵，今到中央弄笔杆。  
莫嗤丘八变诗人，杜甫伤时涕泪新。  
萁豆相煎何太急，英雄虽老岂轮囷。  
抗战今年将胜利，加强团结全民意。  
同室操戈大不该，先生呼唤声声泪。  
六十年间教训多，从头收拾旧山河。  
预期直捣黄龙日，再诵南山祝寿歌。  
(郁达夫 1988：255)

#### 四、结论：遗民情感的迸发与预设读者的消亡

郁达夫在南洋为抗日宣传忙碌，其在东南亚的白话文创作无疑是成功的，并受到现有研究的广泛关注。而在郁达夫的个人情感抒怀上，则转向古典，即旧体诗写作。郁达夫在东南亚期间的重返古典与流动性身份，是其一生具有的“边际”身份的写照，既是外界环境作用的结果，更为关键的则是其自身有意识或无意识选择的结果。郁达夫早年在中国学习，之后留学东洋，回返中国，遑论最终前往南洋，郁达夫的自我选择皆是非“安定”的，具有明显的“在地”与“原乡”的前后分期。郁达夫前期的经历是其后期在东南亚跨域转向的重要诱因，面对亲友，郁达夫坚持原则，却亦留存温情，郁达夫情感丰沛，却亦多动荡。郁达夫为捍卫“燕垒”前往东南亚，而在南洋期间，则久久思念“故园”却未选择复归中国，亦未能实现其行前对于维系家庭的愿望。由于外因的作用，亲族关系上，母兄因战争长逝，婚姻关系上，郁达夫前期经历的与孙荃婚变，与王映霞再婚，至南洋，其与王映霞离异，与李晓音神殇，为掩护身份与何丽有再婚，直至其最终身故，仍未告知何丽有其身份。郁达夫与孙荃成婚同居八年，与王映霞十二年，与何丽有三年，子女关系上，其身故前，孙、王所生子女皆

在中国，孤形单影，遥遥相望。尤其至苏门答腊流亡期间，郁达夫陷入身份认同失序与自我怀疑之中，与其动身前往南洋躲避“蛇鼠”的愿景可谓并行相悖。由此，郁达夫在不断的抗日与流亡中，既未能实现的对于“燕垒”的维系，亦未实现回归原乡的野望。

在此基础上，出于跨域作用及族群社会资本影响，郁达夫在东南亚华人群体间找寻到新的情感依托。以及由于母兄的逝世与家庭的离散，更多的是出于回溯故土的情怀，郁达夫遂以转向古典作为主要表情达意方式，而以与在地华人的连结作为其新的旧体诗创作重要的情感投射对象。郁达夫游离性身份与重返古典产生的重要原因在于，在一定意义上，白话文的语言系统难以承载其庞大的遗民情感。而新文学基调是以“启蒙”作为主调，需要预设的读者，在南洋期间的郁达夫，面对危机时刻庞大的历史结构的自省与流亡的心境，预设的原乡的读者群体已然不复存在。加之面对母亲与长兄的离世，家庭与婚姻关系一再的破碎与重建，数年远离中国为中国抗日笔伐，却成为日军的翻译，在较为强烈的自我矛盾之中，郁达夫身份上的游离性渐进深化，复归古典以抒怀心境。正如郭沫若称郁达夫“卑己自牧”为文坛三绝，“记得是李初梨说过这样的话，‘达夫是摩拟的颓唐派，本质的清教徒’。这话最能够表达了达夫的实际。”（郭沫若 1986：3，23）

表4：郁达夫南洋诗词<sup>8</sup>

| 序号 | 时间       | 地址  | 题名                                                 | 类别      |
|----|----------|-----|----------------------------------------------------|---------|
| 1  | 1938年末   | 新加坡 | 《星洲旅次有梦而作》                                         | 思乡      |
| 2  | 1938     | -   | 《雁》<br>（原载1939年1月1日福州《星焰》旬刊创刊号）                    | 思乡      |
| 3  | 1938年末   | 新加坡 | 《小草》                                               | 示友（李西浪） |
| 4  | 1938年末   | 新加坡 | 《感怀》                                               | 示友（李西浪） |
| 5  | 1939.1.1 | -   | 《廿八年元旦因公赴槟榔屿，闻有汪电主和之谣，车中赋示友人》                      | 示友（关楚璞） |
| 6  | 1939.1.1 | 槟榔屿 | 《抵槟城后，见有饭店名杭州者，乡思萦怀，夜不成寐，窗外舞乐不绝。用谢枋得〈武夷山中〉诗韵，吟成一绝》 | 思乡      |
| 7  | 1939.1.2 | 槟榔屿 | 《云雾登升旗山，菊花方开》                                      | 记游      |
| 8  | 1939.1.2 | 槟榔屿 | 《关君谓升旗山大似匡庐，因演其意》 <sup>9</sup>                     | 思乡      |
| 9  | 1939.2   | 新加坡 | 《赠朱植生先生，因题画像册后》                                    | 示友（朱植生） |
| 10 | 1939.2.7 | 新加坡 | 《前在槟城，偶成俚句，南洋诗友和者如云。近有所感，再叠前韵，重作三章，邮寄丹林，当知余迩来心境》   | 思乡      |
| 11 | 1939年春   | 新加坡 | 《题淡然纪念册》                                           | 示友（莫京）  |

<sup>8</sup> 此表系笔者根据《郁达夫诗词》等郁达夫诗集与《星洲日报》等报章资料整理而成。

<sup>9</sup> 关君，即关楚璞。

|    |           |     |                                                          |             |
|----|-----------|-----|----------------------------------------------------------|-------------|
| 12 | 1939.5    | 新加坡 | 《赠郭氏两姐弟》                                                 | 示友（郭开菊、郭开兰） |
| 13 | 1939.9    | 新加坡 | 《过吉隆坡叶亚来墓》                                               | 记游          |
| 14 | 1939年秋    | -   | 《槐准先生深居郊外，有裴真学风，悲鸿画鸡以申贺，嘱达夫题之，时己卯秋也》                     | 示友（徐悲鸿、韩槐准） |
| 15 | 1939      | -   | 《赠万印楼主张斯仁先生》                                             | 示友（张斯仁）     |
| 16 | 1940年初    | 新加坡 | 《咏星洲草木——题黄葆芳君收藏册页》                                       | 示友（黄葆芳）     |
| 17 | 1940年初    | 新加坡 | 《王声世先生古稀双寿，又庆金婚，躬逢盛典，因缀长句以致贺》                            | 示友（王声世）     |
| 18 | 1940年初    | 新加坡 | 《代洪开榜先生祝梁母邓太夫人八秩开一大庆之作》                                  | 示友（洪开榜）     |
| 19 | 1940.1    | 新加坡 | 《为君濂题海粟画梅》                                               | 示友（徐君濂）     |
| 20 | 1940.2.8  | 新加坡 | 《庚辰元日闻南宁捷报，醉胡社长宅，和益吾老人〈岁晚感怀〉原韵》                          | 示友（胡文虎、陈延谦） |
| 21 | 1940.4    | 新加坡 | 《题姚楚英诗册》                                                 | 示友（姚楚英）     |
| 22 | 1940.4    | 新加坡 | 《得渝友诗柬，谓予尚不孤。实则垂老投荒，正为僇子辈所诟谇。因用原韵，鱼虞通洽奉答，亦兼告以此间人心之险恶耳》   | 示友（郭沫若等）    |
| 23 | 1940.4    | 新加坡 | 《和广勋先生赐赠之作四首》                                            | 示友（曾广勋）     |
| 24 | 1940.5    | 新加坡 | 《祝中兴俱乐部两周年纪念》                                            | 纪念（中兴俱乐部）   |
| 25 | 1940.5.22 | 新加坡 | 《三月一日对酒兴歌》                                               | 感怀          |
| 26 | 1940.5.23 | 新加坡 | 《五月廿三别王氏于星洲，夜饮南天酒楼，是初来时投宿处》                              | 感怀          |
| 27 | 1940.6    | 新加坡 | 《与王氏别后，托友人去祖国接二幼子来星，王氏育三子，长名阳春，粗知人事，已入小学，幼名殿春、建春，年才五六》   | 感怀          |
| 28 | 1940.6    | 新加坡 | 《槐准先生于暇日邀孟奎先生及报社同人游愚趣园，时红毛丹正熟，主人嘱书楹帖，先得首联，归后缀成全篇》        | 示友（韩槐准、黄孟奎） |
| 29 | 1940.6    | 新加坡 | 《孟奎黄先生曾长闽省教育厅，足迹几遍全球，近息影星洲，设帐授徒，学濂溪之课士，因用先生〈课徒感作〉原韵赋赠长句》 | 示友（黄孟奎）     |
| 30 | 1940.7    | 新加坡 | 《〈温陵探古录〉题词》                                              | 示友（陈祖泽）     |
| 31 | 1940.8.7  | 新加坡 | 《送杜迪希先生行》                                                | 示友（杜迪希）     |
| 32 | 1940年冬    | 新加坡 | 《庚辰冬录旧作小游仙诗赠浪漫兄》                                         | 示友（胡浪漫）     |
| 33 | 1940.12   | 新加坡 | 《李伟南、陈振贤两先生招饮醉花林，叨陪末座，感惭交并，陈先生并赐以佳章，依韵奉和，流窜经年，不自知辞之凄恻也》  | 示友（李伟南、陈振贤） |
| 34 | 1940      | -   | 《赠曾梦笔》                                                   | 示友（曾梦笔）     |

|    |           |     |                                                         |                    |
|----|-----------|-----|---------------------------------------------------------|--------------------|
| 35 | 1940      | -   | 《录旧作小游仙诗赠柯进来先生》                                         | 示友（柯进来）            |
| 36 | 1940      | -   | 《月夜怀刘大杰》                                                | 示友（刘大杰）            |
| 37 | 1940      | -   | 《珍珠巴刹小食摊上口占，和胡迈诗原韵》                                     | 示友（胡浪漫）            |
| 38 | 1940      | -   | 《书示江郎》                                                  | 示友（曾梦笔）            |
| 39 | 1940      | -   | 《与江郎对饮座上口占》                                             | 示友（曾梦笔）            |
| 40 | 1940      | -   | 《在黄曼士家见徐悲鸿为王莹绘〈放下你的鞭子〉一剧中的香姐扮相，有感而作。（二首）》 <sup>10</sup> | 作者存疑（未计）           |
| 41 | 1941.1.1  | 新加坡 | 《辛巳元日，重遇紫罗兰女士于星洲，烽火连天，青衣憔悴，大有江州司马之感，赠以长句，聊志雪鸿           | 示友（紫罗兰）            |
| 42 | 1941.1下旬  | 金马仑 | 《游金马仑之作二首》                                              | 记游                 |
| 43 | 1941.3    | 新加坡 | 《为秋杰兄题海粟画松》                                             | 示友（胡秋杰）            |
| 44 | 1941.3    | 新加坡 | 《孟奎先生营敬庐学塾于纽敦郊外，诗以奉贺》                                   | 示友（黄孟奎）            |
| 45 | 1941.3    | 新加坡 | 《为胡仁东先生题海粟大师画芦雁》                                        | 示友（胡仁东、刘海粟）        |
| 46 | 1941.3    | 新加坡 | 《为林建兄题陈月秀女史画〈匡庐图〉》                                      | 示友（林建、陈月秀）         |
| 47 | 1941.3    | 新加坡 | 《为林建兄题月秀女史画〈深山读易图〉》                                     | 示友（林建、陈月秀）         |
| 48 | 1941.3    | 新加坡 | 《为浪漫兄题刘大师画吉了、君濂画石——大师曾题“却似八大山人”六字》                      | 示友（胡浪漫、刘海粟、徐君濂）    |
| 49 | 1941.3.29 | 新加坡 | 《黄花节日与星洲同仁集郭嘉东椰园遥祭，继以觞咏摄影，同仁嘱题照后藉赠园主》                   | 纪念（黄花节）            |
| 50 | 1941.4    | 新加坡 | 《题刘大师画祝融峰水墨中堂》                                          | 示友（刘海粟）            |
| 51 | 1941.4    | 新加坡 | 《题刘大师及徐君濂、刘抗、黄葆芳合作〈岁寒三友图〉，图中有大石》                        | 示友（刘海粟、徐君濂、刘抗、黄葆芳） |
| 52 | 1941.5    | 新加坡 | 《为槐准先生题悲鸿画〈马拉雅山远眺〉》                                     | 示友（韩槐准、徐悲鸿）        |
| 53 | 1941.6    | 新加坡 | 《为霭民先生题经公子渊画松二首》                                        | 示友（林霭民、经颐渊）        |
| 54 | 1941.6    | 新加坡 | 《冯焕章先生今年六十，万里来书，乞诗为寿。戏效先生诗体》                            | 示友（冯焕章）            |
| 55 | 1941.7    | 新加坡 | 《为晓音女士题海粟画〈芦雁〉》                                         | 示友（李晓音、刘海粟）        |
| 56 | 1941.7    | 新加坡 | 《晨雨天凉，吟赠大鹰画室》                                           | 纪念（大鹰画室）           |

<sup>10</sup> 此二诗与黄孟奎《题王莹女士画像·二首》诗作内容基本相同，作者存疑，未计。

|    |           |      |                            |             |
|----|-----------|------|----------------------------|-------------|
| 57 | 1941.7    | 新加坡  | 《星洲闻杨云史先生之讣》               | 纪念（杨云史）     |
| 58 | 1941.7    | 新加坡  | 《读陈孝威先生〈上罗斯福总统书〉后》         | 纪念（陈孝威）     |
| 59 | 1941.7    | 新加坡  | 《为洪开榜先生祝胡文钊先生令堂谢太夫人九秩晋一大寿》 | 示友（洪开榜、胡文钊） |
| 60 | 1941.9    | 新加坡  | 《题张善子〈黄山图〉，和西浪让画诗原韵二首》     | 示友（张善子、李西浪） |
| 61 | 1941.10.5 | 新加坡  | 《中秋口号》                     | 思乡          |
| 62 | 1941      | -    | 《题赵少昂画虎》                   | 示友（赵少昂、叶誉虎） |
| 63 | 1941      | -    | 《题悲鸿画梅》                    | 示友（徐悲鸿）     |
| 64 | 1941      | -    | 《止园钱送徐教授悲鸿席上偶成》            | 示友（徐悲鸿）     |
| 65 | 1941      | -    | 《赠王沉》                      | 示友（王沉）      |
| 66 | 1941      | -    | 《自叹》                       | 思乡          |
| 67 | 1941      | -    | 《题梅魂手册》 <sup>11</sup>      | 示友（王莹）      |
| 68 | 1942.2    | 苏门答腊 | 《星洲既陷，厄苏岛困孤舟中，赋此见志》        | 思乡          |
| 69 | 1942年春    | 苏门答腊 | 《初抵望加丽赠陈长培》 <sup>12</sup>  | 示友（陈仲培）     |
| 70 | 1942年春    | 苏门答腊 | 《题友人郑泗水半闲居》                | 示友（郑泗水）     |
| 71 | 1942年春    | 苏门答腊 | 《乱离杂诗十二首》                  | 思乡          |
| 72 | 1942.4    | -    | 《去卜干峇鲁留赠陈金绍》（《赠印尼画家张乙鸥》）   | 示友（张乙鸥）     |
| 73 | 1943.9    | 苏门答腊 | 《无题四首——用〈毁家诗纪〉中四律原韵》       | 思乡          |
| 74 | 1944      | 苏门答腊 | 《胡迈来诗，会有所感，步韵以答》           | 示友（胡浪漫）     |
| 75 | 1945年春    | 苏门答腊 | 《题新云山人画梅》                  | 示友（张乙鸥）     |

## 参考文献

陈子善、王自立编，1986，《回忆郁达夫》，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Hsia, Chih-ting 1974.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胡从经，1984，《郁达夫日记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胡浪漫，〈缅怀郁达夫先生〉，《联合早报》，1986年1月26日。

胡愈之，1946，《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香港：咫园书屋。

李庆年，1988，《马来亚华人旧体诗演进史（1881-194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梁实秋，1992，〈清华八年〉，梁实秋著《梁实秋文坛沉浮录》，合肥：黄山书社，页121-147。

铃木正夫，1969，〈郁达夫的流亡与失踪——原住苏门答腊日本人的证言〉，伊藤虎丸、稻叶昭二、铃木正夫编《东洋学文献中心丛刊 第五辑 郁达夫资料》，东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附属东洋学文献中心。

<sup>11</sup> 梅魂，无考。依笔者所考，梅魂或可能为“新中国剧团”副团长王莹。

<sup>12</sup> 陈长培，即陈仲培。

- 铃木正夫, 1996, 《苏门答腊的郁达夫》, 李振声译, 上海: 远东出版社。
- 陆费澄, 1996, 〈孙荃心目中的郁达夫〉, 蒋增福编《众说郁达夫》,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页380-385。
- 梅其瑞, 1984, 〈郁达夫遇害之谜〉, 王润华编《郁达夫卷》, 台北: 远景, 页299-334。
- 奥尔罕·帕慕克, 2011, 《别样的色彩》, 宗笑飞、林边水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汪兆骞, 2019, 《民国清流: 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北京: 现代出版社。
- 汪兆骞, 2019, 《民国清流2: 大师们的“战国”时代》, 北京: 现代出版社。
- 汪兆骞, 2019, 《民国清流3: 大师们的中兴时代》, 北京: 现代出版社。
- 汪兆骞, 2019, 《民国清流4: 大师们的抗战时代》, 北京: 现代出版社。
- 王列耀, 2007, 〈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异族叙事”——以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为例〉, 《文学评论》, 第6期, 页166-170。
- 王润华, 1984, 《郁达夫卷》, 台北: 远景。
- 王任叔, 2006, 〈记郁达夫〉, 李杭春、陈建新、陈力君编《中外郁达夫研究文选》(上册), 页58-88。
- 王映霞, 1992, 《我与郁达夫》, 南宁: 广西教育出版社。
- 王映霞, 2008, 《王映霞自传》, 合肥: 黄山书社。
- 温梓川著、钦鸿编, 2006, 《郁达夫别传》, 新加坡: 青年书局。
- 郁达夫, 〈寻人启事〉, 《大公报》, 1938年7月5日、6日。
- 郁达夫, 〈道歉启事〉, 《大公报》, 1938年7月10日。
- 郁达夫, 1982, 《郁达夫游记集》,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 郁达夫, 1985, 《郁达夫文论集》,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 郁达夫, 1988, 《郁达夫诗词集》,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 郁达夫, 1990a, 《郁达夫散文全编》,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 郁达夫著、郁风编, 1990b, 《郁达夫海外文集》, 上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郁达夫, 2008, 《达夫书简: 致王映霞》,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 郁达夫, 2008, 〈闽游日记〉, 吴秀明编《郁达夫全集》, 第五卷,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页405-535。
- 郁飞, 1996, 〈郁达夫的星洲三年〉, 蒋增福编《众说郁达夫》,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页355-279。
- 郁云, 1986, 《我的父亲郁达夫》, 台北: 兰亭。
- 张紫薇, 1984, 〈郁达夫被害前后〉, 王润华编《郁达夫卷》, 台北: 远景, 页337-367。
- 郑伯奇, 1982, 〈左联回忆散记〉, 《新文学史料》, 第1辑, 页14-23。
- 佐藤春夫, 2010, 〈呼唤旧友〉, 武继平译, 《郭沫若学刊》, 第3期, 页67-70。